

承续与复归:论元代前期崇尚“《选》诗”的风气

赵建章,喻佳鹏

(青岛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选》诗”在元代前期的诗学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面临时代变迁和诗坛转型的现实之需,元代前期的诗人和诗论家承续了南宋诗人重视“《选》诗”的特点,诗坛上弥漫着复归“《选》诗”传统的风气。元代前期的诗人和诗论家或在梳理诗歌发展历史的过程中重新审视“《选》诗”的地位,或在反思当时诗坛积弊的过程中将“《选》诗”作为救弊的良方,或在建构自身清邃雅正诗学体系的过程中将“《选》诗”作为审美的典范。由此,元代前期形成了对“《选》诗”的完整认识与阐释。元代前期诗人和诗论家对“《选》诗”的推崇影响到了元代中后期诗人和诗论家的诗学理论建构,是元代诗坛“以晋参唐”诗学理念的重要表现。

关键词:元代诗学;“《选》诗”;诗学风气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6-0061-07

收稿日期:2025-09-02

基金项目: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22JJD750033);汉魏六朝诗歌创作批评与尚文精神研究。

作者简介:赵建章(1969-),男,山东昌邑人,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喻佳鹏(2001-),男,湖南长沙人,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6.004

南宋诗论家曾季狸曾在《艇斋诗话》中说:“近世人学诗,止于苏、黄,又其上则有及老杜者,至六朝诗人,皆无人窥见。若学诗而不知有《选》诗,是大车无輹,小车无輹。”^①在他看来,自江西诗派盛行之后,诗人往往取法苏轼、黄庭坚,直接以杜甫为宗。而六朝诗人往往陷入无人问津的窘境,正可谓“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②直到乾道、淳熙年间,诗人才重新开始重视“《选》诗”并创作出了大量的仿作。^③南宋以后,面临时代变迁和诗坛转型的需要,元代前期的诗人和诗论家继承了南宋诗人重视“《选》诗”的特点,他们极力复归“《选》诗”的传统,诗坛上弥漫着一种崇尚“《选》诗”的风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选》诗”接受谱系。可以说,“《选》诗”不仅成为元代前期诗学与南宋诗学相勾连的桥梁,更成为元代诗学独立发展的重要资源。

本文所言的“《选》诗”取其狭义,即萧统《昭明文选》所收汉魏至南朝梁的诗歌。当前学者多从文献学的角度研究元代诗人对《昭明文选》的接受^④,而较少从元代诗坛的语境出发,思考元代前期诗人和诗论家崇尚“《选》诗”的深层原因及其表现。虽然元代前期的诗人和诗论家对“《选》诗”的评点与接受较为分散,但是他们整体上表现出了对“《选》诗”强烈的喜好。从元代前期诗人和诗论家对“《选》诗”的关注可以窥探元代前期诗学的基本面貌,更能理解元代诗坛“以晋参唐”的诗学特色。

一、诗歌发展的枢纽

近代文人沈曾植曾在《与金甸丞太守论诗书》中提出诗歌发展的“三关说”。其中,元嘉诗歌被他视为通达诗歌发展的“第三关”。随后,马一浮在他的基础上演变出“四元说”,更加强调元嘉诗歌在诗学转型上的关键地位。从“关”和“元”可以看出这批近代文人对魏晋诗歌的重视。实际上,早在元代前期,面对诗学转

①[宋]曾季狸:《艇斋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296-297页。

②[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六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册,第2124页。

③史伟:《南宋“选体诗”的重新发现及其诗学意义》,《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3期。

④如罗琴虽集中探讨了元代对《文选》的接受,但她的研究偏重于文献考证。(罗琴:《元代文选学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年)

型关键期的诗人和诗论家更早看到了中古诗歌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性。他们将自己的诗学眼光聚焦于“《选》诗”，重新审视了“《选》诗”的枢纽位置。

元代前期的文人大部分由金、宋入元，他们普遍秉持着通达古今之变的共识。现实的困境让他们重新反思宋亡的教训，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亦伴随着一种浓烈的遗民意识。这种历史的反思同样弥散到元初的诗坛。这也导致了元代前期的诗人和诗论家重新梳理诗歌的发展历史。这批由宋入元的诗人选择回溯宋代以前的诗歌发展历史，反思当前诗歌发展的窘境，寻找诗歌发展的源头，拨正当下诗歌的弊病，以警示后世的诗人。浓郁的遗民意识与强烈的家国情怀也让他们的诗论中充盈着“正本清源”的气息。宋末元初的文人赵孟坚就曾说到：

自《离骚》、国风、雅、颂而离骚，皆归于正之诗也。杜工部诗言爱君忧国不失此正，所以独步于诗家者流也。由汉苏、李五言，建安七子、晋、宋之清虚，齐、梁之靡丽，至唐而歌行吟谣，怨叹词曲等此而律生焉。诗之体备，而诗亦变矣。^①

他梳理了整个诗歌的发展流变过程，将上古时代的诗歌、《诗经》以及《离骚》视为诗歌的正体，杜甫的诗歌因为其忧君爱国的特质同样被视为诗歌的正体。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这些遗民诗人眼中怀有家国之忧的诗歌才不失其雅正。这也彰显出遗民诗人深厚的家国意识。而风格各异的“《选》诗”都是从这些正体衍生而来，承续着诗骚传统，又启发着唐诗的发展理路，处于古体诗和律诗发展的枢纽位置。

其实不仅仅是宋末，这种“正本清源”的诗论更是普遍存在于元代前期的诗坛当中。黄庚和方回等都持有类似的论断：

自《三百篇》迄于战国，诗之脉几绝，而《骚》续之，故《骚》有功于诗。《骚》之下有《选》，由《选》而至于唐，惟杜少陵为备。^②

皋歌，诗之始；孔删，诗之终；屈骚，诗之变。论今之诗，五七言古律与绝句凡五体，五言古汉苏李、魏曹刘，晋陶谢，五言律、七言律及绝句自唐始盛。^③

不难发现，元代前期的这批诗人和诗论家在追根溯源的过程中都将《诗经》作为诗歌发展的正体，而“《选》诗”由这一正体演变而来。在他们的眼中，“《选》诗”虽然属于正统诗歌的变体，但是同样处于诗歌发展的关键时期。元代前期的诗人和诗论家试图溯源诗歌发生之初意，上通《诗经》，藉由“《选》诗”和唐诗的发展路径，实现祛旧除弊之目的，进而恢复诗歌原本生机勃勃的面貌。由此，他们竭力勾勒出了一条“《诗经》→《离骚》→‘《选》诗’→唐诗”的诗歌发展脉络。这不仅仅是元代前期诗人在诗学转型时期对诗歌发展历史的重新审视与梳理，更是他们理想化的一条学诗路径。刘因就在《叙学》中极力推崇这条学诗门径：“故作诗者，不能《三百篇》则曹、刘、陶、谢，不能曹、刘、陶、谢则李、杜、韩”。^④在他的眼中，作诗者应该遵循这套学诗路数，如果不能学到《诗经》的雅正就应该转而学“《选》诗”。如果不能学到“《选》诗”的精妙之处则应该转而学习唐诗。可以说，“《选》诗”是元初诗人学诗除了《诗经》之外的第二选择。

从元代诗人和诗论家梳理诗歌历史的过程，不难看出，在元代前期诗人和诗论家的眼中，“《选》诗”当为第二等。这里的“第二等”，强调的是“《选》诗”在整个诗歌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选》诗”是古体诗与律诗发展的枢纽，具有让后世诗人学习和效法的价值。这也成了元代前期诗人和诗论家的普遍共识。例如郝经就曾在《一王雅序》中提到：“汉魏而下，曹、刘、陶、谢之诗，豪赡丽缛，壮峻冲澹；状物态、寓兴感、激音节，固亦不减前世骚人词客。”^⑤在这篇诗序中，他实际上本意在推举先秦以来叙述王道的诗歌，但是，在他看来，汉魏至晋宋这些诗歌气格高古、音节浏亮，同样具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再如，赵文指出：“近世士无

①[宋]赵孟坚：《赵竹潭诗集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七八七六，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41册，第245页。

②[元]黄庚：《月屋漫稿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六一〇，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9册，第566页。

③[元]方回：《恢大山〈西山小稿〉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二一四，第7册，第136页。

④[元]刘因：《叙学》，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四六四，第13册，第392页。

⑤[元]郝经著，田同旭校注：《郝经集校勘笺注》卷二十八，太原：三晋出版社，2019年，第11册，第2125页。

四六时文之可为，而为诗者益众。高者言《三百集》，次者言《骚》言《选》，出入韦、柳诸家，下者晚唐、江西。”^①在他的眼中，当时主张学习《诗经》的诗人当为高者，而稍次的诗人则主张效法“《选》诗”，出入于韦应物和柳宗元之间。由此可见，在元代前期的诗人和诗论家眼中，学习“《选》诗”亦能通达古今的诗歌创作之法。

南宋的诗人和诗论家虽然已经挖掘了“《选》诗”独特的价值，但他们并没有强调“《选》诗”在整个诗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位置。而元代前期的诗人和诗论家在梳理诗歌流变的过程中关注到了“《选》诗”正处于打通古今诗歌脉络的枢纽环节。由此，“《选》诗”在元代前期的诗坛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二、革除积弊的良方

从整体上看，元代前期的诗坛主要承续着金朝和宋季的诗歌路径。苏天爵曾指出：“我国家平定中原，士踵金、宋余习，文辞率粗豪衰茶。”^②由此可见，由金、宋入元的诗人和诗论家基本上都保留着他们既有的诗学眼光。同时，金、宋时期所产生的诗学问题也同样进入元代。这些诗学积弊让元代前期的诗人和诗论家开始反思诗歌发展的走向，他们试图解决金宋遗留下来的诗学问题。具体来看，元代前期的诗坛所面临的问题有二：其一，北方金代诗坛师法盛唐带来的粗豪鄙陋气息；其二，南方宋末诗坛师法晚唐带来的卑琐枯寒格调。

王恽曾提到：“金自南渡后，诗学为盛，其格律精严，辞语清壮，度越前宋，直以唐人为指归。”^③他在这里总结了金代后期诗歌的发展路径：诗坛上学宋带来的怪奇风气逐渐被纠正。诗人大都选择效法唐人，追求格律的精严，语言的清新壮健，颇具唐诗的风貌。具体来说，金代诗坛的崇唐倾向以赵秉文和李纯甫为代表。刘祁在《归潜志》中记载到：“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倡之……赵闲闲晚年诗多法唐人李、杜诸公，然未尝语于人。已而，麻知己、李长源、元裕之辈鼎出，故后进作诗者争以唐人为法也。”^④可见，在赵秉文的带领下，金代后期取法唐诗的诗人云集景从。学唐已然成为一种诗学的风尚。虽然金代后期的这批诗人以唐诗的浑融典厚剔除了金代诗坛浮艳尖新的旧习，但是一味地效仿唐诗也让他们的诗歌多了粗豪的气息。钱基博就曾批判赵秉文：“诗则为顿挫而欠沉郁，欲真淳而流浅率。”^⑤他直接指出了赵秉文诗歌学唐内蕴不足而流入浅陋简率的一面。而仿拟赵秉文诗歌的后学者更是无法避免这些问题。这就导致了元初诗坛上仍洋溢着金末诗人学盛唐诗带来的粗鄙气息。

袁桷曾说：“江西大行，诗之法度益不能以振夷陵。渡南糜烂而不可救，入于浮屠老氏证道之言，弊孰能以救哉？”^⑥在他看来，江西诗派盛行之后，诗歌的法度已然不能恢复到唐诗的样貌，南宋之后的诗歌更是走向了糜烂而无法拯救的境地。宋诗发展到后期已经陷入泥淖之中。一批诗人和诗论家开始对江西诗学进行反思与补偏。宋季诗人虽然同样选择重新复归唐诗的传统，但是与金代高举盛唐诗风不同，当时南宋末年的诗人普遍选择了以贾岛和姚合为代表的晚唐诗风。其中，永嘉四灵率先选择师法贾岛和姚合以晚唐诗的“敛情约性”摆脱江西诗派的“汗漫广漠”。永嘉四灵之后，江湖诗人同样选择以晚唐诗调和江西诗派。他们卑弱的诗风，俚俗的语言以及细碎的内容进一步将宋诗带入了卑靡琐碎的境地。宋末元初的诗人关注到了江湖诸人的弊病，他们在思考自身诗学出路的同时，展开了一系列的批评。方回曾描述了江湖诗人追随永嘉四灵，竞相效仿“晚唐”诗的状况：“近世为诗者，七言律宗许浑，五言律宗姚合，自谓足以符水心四灵之好。而斗钉粉绘，率皆死语哑语。是以为游走乞食之具，而诗道丧矣。”^⑦在方回眼中，江湖诗人所创

①[元]赵文：《诗人堂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三三四，第10册，第107页。

②[元]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95页。

③[元]王恽著，杨亮、钟彦飞点校：《王恽全集汇校》卷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册，第2048页。

④[金]刘祁著，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5页。

⑤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82页。

⑥[元]袁桷撰，王頔点校：《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九，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册，第1148页。

⑦[元]方回：《滕元秀诗集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二一一，第7册，第75页。

作的这些诗歌是他们处于困顿之际所作,反映了宋末诗歌发展的颓丧。从“哑语”“死语”也可以看出方回对江湖诗人的否定态度。元初的诗人赵文更是直接从江湖诗人的人格出发多角度地批评他们诗歌创作上的问题。他指出:“江湖者,富贵利达之求而饥寒之务去,役役而不休者也。其形也不全而神伤矣,而又拘拘于声韵,规规于格体,雕镂以为工,幻怪以为奇,诗未成而诗之天去矣。”^①他在这里指出江湖诗人饥寒交迫的人生境遇导致了他们的诗作形散无神,拘泥于声律和体格,又落入雕饰和怪奇的窠臼,已然偏离了诗歌原本的样貌。

为了洗净南北方衰飒窘迫的诗风,元代前期的诗人选择复归古体诗的传统,借“《选》诗”的高逸秀丽铲除北方盛唐诗风的粗鄙与南方晚唐诗风的卑弱。宋末遗民何梦桂曾说到:“唐诗自陈子昂一唱,至李、杜大成,为不可及已。其他诸作,视魏建安七子与晋陶、谢数子,又彼此一时也,况晚唐以下诗乎?今之学诗,未梦到唐人影响,其去魏晋益远矣,故诗未易言也。”^②在他看来,晚宋的诗歌既没能取法到唐诗的精髓,又与“《选》诗”相去甚远。他在这里将江湖诗人所写的“晚唐体”与“《选》诗”进行对比,实则启发后世学诗者即使做不到李杜之大成,也应该承袭“《选》诗”的高古绝尘。宋末元初的刘辰翁在指出江湖诗人带来的卑琐风气之后,紧接着说到“余尝谓晋人语言使壹用为诗,皆当掩出今古,无他,真故也。”^③他在这里虽是强调晋人作诗语言的自然真趣,但实际上体现出刘辰翁对“《选》诗”天然旨趣的高度赞赏。当然,刘辰翁并非一味揄扬“《选》诗”,他也从“气格”的角度指出了“《选》诗”的不足。^④他的儿子刘将孙也只是继承了其父推崇晋人高妙造语的观点指出:“晋人善语言,其言明且清。少许胜多多,飘萧欲通灵。使其入韵语,岂但诸子鸣。安得三谢辞,远与陶阮并。”^⑤可见,他们希望用《选》诗细润的语言改变金代和宋末诗坛的鄙俗气息。方回同样在晚年转变自己的诗学路径,将目光转向“《选》诗”,借以补救当时诗坛格调卑弱的弊病。例如,方回不满于晚唐诗的卑靡细琐,他在《文选颜鲍谢诗评》中,将晚唐体这种毛病的源头指向永明体:

“花丛乱数蝶,风帘入双燕。”灵运、惠连、颜延年、鲍明远,在宋元嘉中未有此等绮丽之作也。齐永明体自沈约立为声韵之说,诗渐以卑。而玄晖诗徇俗太甚,太工太巧。阴、何、徐、庾继作,遂成唐人律诗,而晚唐尤织琐,盖本原于斯。^⑥

方回在这里,原本是批评谢朓诗歌俗气过重,工巧太甚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他看到了永明体和晚唐体两者的共性,并认为晚唐诗风的织琐就来自于此。可以说,方回在这里不仅看到了“《选》诗”中的不足之处,他更是借助于“《选》诗”发现了宋季诗风弊病的根源,这也是方回对宋末元初诗坛的自赎性反思。

需要注意的是,金末和江湖诗派的部分诗人其实同样将“《选》诗”视为他们的典范。金末文人赵秉文曾说到:“为诗当师三百篇、《离骚》、《文选》、《古诗十九首》,下及李、杜……尽得诸人所长,然后卓然自成一派。”^⑦他在这里特意将“《选》诗”作为自己的师法对象。赵秉文不仅做到了理论上推崇“《选》诗”,更是在创作上做到了拟古学古而不拘泥于古。但是,与赵秉文同声相应的诗人往往只关注其学唐的一面,导致金末诗人忽视了“《选》诗”的重要性,更直接造成了师法古体诗脉络的断裂。江湖诗派中也有诗人效仿“《选》诗”以至于近体学唐,古体学选体,成为江湖诗派的一种时尚和定格。^⑧遗憾的是,江湖诗人没有学到“《选》诗”的精髓,往往只是化用“《选》诗”的语典,追求“《选》诗”的骈俪。刘将孙就批评他们:“尊晚唐过风雅,高者诡《选》体如删前,缀袭熟字,枝蔓类景,轧屈短调。”^⑨江湖诗派中选择学“《选》诗”的诗人虽然被刘将孙

①[元]赵文:《萧汉杰青原樵唱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三三二,第10册,第64页。

②[宋]何梦桂:《琳溪张兄诗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八二九四,第358册,第106页。

③[宋]刘辰翁:《简斋诗集序》,吴树阴、金天厚点校:《陈与义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页。

④王术臻:《宋元诗学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18-119页。

⑤[元]刘将孙:《感遇(其五)》,杨镰主编:《全元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8册,第176页。

⑥[元]方回选评,李庆甲校点:《文选颜鲍谢诗评》卷四,《藏奎律髓汇评》附录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5册,第2048页。

⑦[金]赵秉文撰,孙德华点校:《闲闲老人滹水文集》卷十九,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52页。

⑧吕肖奭著:《宋诗体派论》,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16页。

⑨[元]刘将孙:《黄公海诗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六二二,第20册,第167页。

视为高者，但他们只是蹈袭“《选》诗”中的字词，堆砌“《选》诗”中的景貌，并没有太多可圈点的地方。

为了革除金朝和宋末诗坛的积弊，元代前期的诗人和诗论家在前人广阔的诗学遗产中寻求解救的良方，而“《选》诗”以其典丽深厚被这些诗人和诗论家关注。同时，南宋部分诗人以晋宋古体诗救济江西后学滞涩灭裂诗风的举措^①启发了元代前期的诗人和诗论家。因而，“《选》诗”在元代前期带有救弊的意味。

三、理想诗学的范式

元代前期的诗人和诗论家在梳理诗歌的发展历史之后，重新厘清了“《选》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价值。同时，在元初粗浅鄙俗的诗坛语境之下，他们又将“《选》诗”视为解决当下诗坛困境的良方。除此之外，元代前期的诗人和诗论家在构建自身的自然、性情之真和清邃等诗学理念时，同样将“《选》诗”视为自己理想诗学的范式。这与“《选》诗”自身的特色和生成语境息息相关。

查洪德曾指出：“元人论诗，几乎人人谈自然”。^②从他的论断中可以看出元代诗人和诗论家对自然的崇尚。“《选》诗”横跨汉魏晋宋多个时间段，其中不乏浑成自然之作。例如，方回就热衷建安诗歌和陶渊明的诗歌。他曾指出：“汉有建安四子、晋有陶渊明……此后世之谓诗也。”^③在他看来，只有建安诗歌和陶渊明的诗歌才为第一等。不仅如此，方回还在《文选颜鲍谢诗评》中表达自己对自然浑成建安诗歌的偏爱。在该书中，他虽然没有直接评点建安时期的诗作，但是多次将建安时期的诗歌与晋宋间的诗歌作比较，体现出他对建安诗学的强烈喜好。例如，他在评价谢灵运的《登池上楼》时指出：“此句之工，不以字眼，不以句律，亦无甚深意奥旨。如古诗及建安诸子，‘明月照高楼’，‘高台多悲风’及灵运之‘晓霜枫叶丹’，皆天然浑成，学者当以是求之。”^④谢灵运的这首诗历来因为奇巧被诗论家视为佳作。而方回却认为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一联，不在于工巧织组，而在于天然浑成。在这里，他继承了宋代诗论家叶梦得和葛立方的诗论观点。同时，他还指出这首诗同《古诗十九首》、建安诸子的诗歌以及谢灵运的《晚出西射堂》一样，真正意义上做到了不假绳削而天然自成。当然谢灵运的诗歌也不全似建安诗歌的浑融自洽。方回在评价谢灵运的《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时就指出：“此诗排比整密。建安诸子，混然天成，不如此。陶渊明剥落枝叶，不如此。”^⑤谢灵运的这首诗铺排严整，结构细密，不似建安诗歌的浑融，也不同于陶渊明的洗练。因此，方回表现出一种否定的态度。受到所点评的“《选》诗”影响，方回在自己的创作中同样效仿“《选》诗”，让自己的诗歌多了一层自然灵动的妙趣。戴表元就指出方回的诗歌创作：“大篇清新散朗，天趣流洽，如晋宋间人醉语。”^⑥由此可见，方回不仅开展了一系列的诗歌评点，在理论上要求学者效法“《选》诗”中的自然诗作。他更在创作上亲自实践，展现出了“《选》诗”清逸高绝的特色。他的这种诗学观念也影响了戴表元。他认为：“为诗必拟古，自近古名能诗人，陶、谢以来之作，规模略尽，故下笔辄无今人近语。”^⑦戴表元在这里直接指出，作诗必须模拟古人的创作。这是因为“《选》诗”已经摒弃了原本的雕饰，能够做到自然天趣。可见，在元代前期，诗人和诗论家纷纷将“《选》诗”作为他们建构自然诗学观的审美范式，皆表现出对“《选》诗”自然浑成的喜爱。

其实不仅仅是方回和戴表元，元代前期的袁桷也表达了自己对“《选》诗”的喜爱。他在《书程君贞诗后》中提到：“萧统之集，《雅》未之见也。诗近于《风》，情性之自然。”^⑧他将“《选》诗”与《诗经》进行比较，指出“《选》诗”虽无《雅》的典丽，但接近于《风》。随后，他又进一步指出这是因为“《选》诗”能够做到情感自然真

①喻佳鹏：《论宋人以晋宋高风济江西之弊》，《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②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9页。

③[元]方回：《跋冯庸居恪诗》，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二一七，第7册，第218页。

④[元]方回选评，李庆甲校点：《文选颜鲍谢诗评》卷四，第5册，第2048页。

⑤[元]方回选评，李庆甲校点：《文选颜鲍谢诗评》卷三，第5册，第2015页。

⑥[元]戴表元著，陆晓东、黄天美点校：《戴表元集》卷八，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上册，第183页。

⑦[元]戴表元著，陆晓东、黄天美点校：《戴表元集》卷八，上册，第188页。

⑧[元]袁桷撰，王頊点校：《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第4册，第1125页。

挚。在元代诗人和诗论家的眼中,《诗经》是醇正真情的典范。^①而袁桷在此处却将“《选》诗”与《诗经》并提。可见,在袁桷的心中,“《选》诗”已然达到了《诗经》的高度,同样是诗人学习的典范。实际上,袁桷在这里是从另一个层面看到了“《选》诗”的独到之处——即“《选》诗”中情性的真切。元代前期的诗论家何中曾在《与詹叔厚书》中说:“古之诗,因其性情之真,即其事物之理,其辞皆出于诚,而足以感发善心,惩创逸志”^②这里的古诗所指的即为“《选》诗”。如果说《诗经》是他们构建“性情之正”诗学观的重要典范,那么“《选》诗”恰好是他们构建“性情之真”诗学观的另一重要典范。元代前期还有吴澄对“《选》诗”有所关注。作为哲学家和诗论家,他在构建自身“性情”诗学的过程中,同样将“《选》诗”视为自己的典范。首先,他在《胡器之诗序》一文中指出:“盖自骚、《选》以来,作者之辞志淳漓胸次,见趣议论往往度越辈流。”^③他指出了自从《离骚》和“《选》诗”以来,诗人往往将自己的情感郁结在心中,诗歌中的情感机抒与议论哲思已经超越前面的诗歌。吴澄在这里刻意标举这类抒发情性的诗歌,是因为这类诗歌是他所高度推崇的。吴澄后来在《谭晋明诗序》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这篇诗序的开头,他直接表示诗歌是用来传达真切情感的,《诗经·国风》做到了这一点。而后世的诗人之所以不能再续《国风》的高度,是因为这些诗歌皆出于自然。紧接着,吴澄直接指出:

汉、魏逮今,诗凡几变。……识者乃或舍旃而尚陶、韦,则亦以其不炼字、不逐字、不用事,而情性之真近于古也。^④

可见,汉魏之后,随着诗歌创作的变化,一部分诗人掌握到了“情性之真”的精髓,他们效仿陶渊明的自然,而做到了“《选》诗”的情志真切。由此可见,在吴澄的眼中,诗歌创作只有做到洗净雕饰、纯正自然,才能真正地表现出真实的情愫。可以说,诗歌创作的天然浑成是通达性情之真的必由之径。

除了对自然和性情之真的追寻,元代诗坛上还表现出一种尚“清”的审美取向。^⑤刘将孙就在《彭宏济诗序》中指出,诗歌“往往无清意则不足以名世”。^⑥他的诗论观点虽然过于激烈,但是可以反映出元代诗人和诗论家普遍追求“清”的景况。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诗”所表现出的清朗俏丽风貌,同样也让元代前期的诗人和诗论家追捧“《选》诗”。例如,方回在《冯伯田诗集序》中构建自己的清新诗学观时,所举的诗例大部分皆出自于“《选》诗”。吴澄也在《盛子渊藁序》中指出卢挚所作的古诗“类皆魏晋清言”^⑦,强调元代诗人对“《选》诗”清丽的追慕。

可以说,基于建构自身诗学理论体系的现实需要,元代前期的诗人和诗论家将“《选》诗”当成自己理想诗学的范式。十分巧合的是,元代前期诗人和诗论家极力追求的自然、性情之真和清邃等等这些诗学观念,都在“《选》诗”中有所体现。故而,“《选》诗”受到大部分的诗论家的追捧。

余 论

元代前期的诗人和诗论家或在梳理诗歌发展历史的流变中重新审视“《选》诗”的地位,或在反思元初诗坛积弊的过程中将“《选》诗”作为救弊的良方,亦或在建构自己清邃雅正的诗学体系时将“《选》诗”作为审美的范式,这都体现出他们对古体诗传统的重视。实际上,除了高举“《选》诗”的高妙之外,元代前期还有一部分诗人和诗论家关注到了《昭明文选》所录诗歌作品的不足。吴澄曾在《邓性可删藁序》中指出:“汉、魏以

①元人关于《诗经》与诗歌“性情”的讨论,参见王珏《元代〈诗经〉学与元代诗歌“性情”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②[元]何中:《与詹叔厚书》,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六八八,第22册,第171页。

③[元]吴澄著,方旭东、光洁点校:《吴澄集》卷十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册,第332-333页。

④[元]吴澄著,方旭东、光洁点校:《吴澄集》卷十七,第1册,第379页。

⑤“清”这一审美范畴是元代诗学领域的核心关键词,参见邱江宁《元代诗学“清”之审美形态》,《文学评论》2025年第3期。

⑥[元]刘将孙:《彭宏济诗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六二二,第20册,第168页。

⑦[元]吴澄著,方旭东、光洁点校:《吴澄集》卷二十二,第1册,第464页。

来,诸诗人萧选者删非不严,而识者有遗憾焉。”^①具体来说,吴澄所言的“识者”指的是宋末元初的陈仁子。陈仁子在元大德三年刊刻完《六臣文选注》之后,他注意到了萧统收录作品的局限性。他按照自己“后浮靡而先典实,略葩藻而资经纶,始朝廷缙绅而次山林草野。”^②的编选原则,编选了《文选补遗》四十卷。在《文选补遗》中,陈仁子虽然将诗歌置于诏诰、奏疏等实用文体之后,但是他依旧重视诗歌这类文体,特别是古体诗。结合陈仁子在《跋曾逢尧序》中的诗学观念,可以窥见他对古体诗的基本态度。他指出:“古以学问为诗,后世以声律为诗。以学问为诗,既函且博。以声律为诗,不窅且陋。”^③可见,在陈仁子眼中,在声律发现之后,诗人的创作开始走向鄙陋,而古体诗以其广博优于后世的律诗。

无论是将“《选》诗”视为典范,还是关注到其不足,其实都可以看出这些诗人和诗论家对“《选》诗”的重视程度。元代前期诗坛复归“《选》诗”的风气同样影响到了之后的诗人和诗论家。元后期的赵汭就曾在《郭子章望云集序》中云:“(郭奎)古五言远宗魏晋,得其高风远韵,不杂后人一语。”^④他受到前辈的影响以“《选》诗”为宗,畅扬古体诗传统。可以说,元代前期的诗人和诗论家改变了宋代以来魏晋高风“少衰”的困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选》诗”的接受谱系,更通过建构古体诗传统,为元中后期的复古思潮提供了“古法”依据,沾溉一代。

Continuity and Return: on the Preference of *Wenxuan* Poems in the Early Yuan Dynasty

ZHAO Jian-zhang, YU Jia-p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The *Wenxuan* Poems hel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studies during the early Yuan Dynasty. Faced with the realities of changing tim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etry scene, poets and poetry critics of the early Yuan Dynasty continued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poets' emphasis on the *Wenxuan* Poems, and a trend of returning to the tradition of “The Selected Poems” prevailed in the poetry scene. Poets and poetry critics of the early Yuan Dynasty either re-examined the status of ‘*Wenxuan* Poetry’ while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poetry development, or regarded *Wenxuan* Poetry as a remedy for the ills of the contemporary poetry scene while reflecting on its shortcomings, or used ‘*Wenxuan* Poetry’ as an aesthetic model while constructing their own refined and elegant poetic systems. As a result, the early Yuan Dynasty developed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Wenxuan* poetry.’ The admiration for ‘*Wenxuan* Poetry’ by poets and literary critics of the early Yuan Dynasty influence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poets and literary critics in the later Yuan Dynasty, embodying the literary philosophy of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Jin to enrich Tang’ in the Yuan Dynasty’s literary circles.

Key words: Yuan Dynasty’s poetry; *Wenxuan* Poems; poetic style

[责任编辑 唐音]

①[元]吴澄著,方旭东、光洁点校:《吴澄集》卷十五,第1册,第318页。

②[元]谭绍烈:《文选补遗序》,刘铎、王翠红主编:《文选资料汇编·序跋著录卷》,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76页。

③[元]陈仁子:《牧莱胜语二稿》卷八,《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20册,第472页。

④[元]赵汭:《郭子章望云集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一六六七,第54册,第453页。